

对“技术理性批判”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技术观的一个反拨

孙 越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逻辑主线,同时也是当今哲学尤其是生态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明确提出技术理性是阻碍社会进步、导致人类异化的观点以来,技术理性就一直被视作是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绊脚石,于是学者们纷纷对其进行批判。尽管“技术理性批判”的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批判的过程中,这一思想从根本上缺乏对其理论本身的批判。反思法兰克福学派在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中对技术理性的剖析,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忽略了技术理性本身所应遵循的价值理性,而单纯地把技术理性看做是工具理性的表征,从而使本身就是“单向度的人”进一步陷入了“单向度的思维”中。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3)02-0090-05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理性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而发生的。技术理性是指在工业社会中将技术等同于物一样对待,即技术的物化,物化的结果则是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分离——人们只需要关心“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技术被当做是认识世界的一种逻辑工具,技术理性包含定量化和形式化两种表现形式。尽管科技对自然的巨大征服力和作用力再次确证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和笛卡尔“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观点,但同时它也陈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19世纪以来,科技理性的形式化、工具化已经导致了人文精神与科技精神的分离与对立。科技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危机。人类运用科技认识和改造自然,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人与自然双方利益的最大化。然而,技术理性不仅让人类

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也使人类生存所必须依赖的自然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具体表现为:在工业社会的机器大生产中,分工使得生产日益专业化,劳动者因长期从事一种单一的劳动而逐渐机械化和孤立化。主体在生产体系中被动地工作,成为和客体相类似的生产体系中的一部分。“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征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1]。异化的生产加速了人内在非理性欲望的膨胀,膨胀的直接后果和表现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们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认真地审视了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千疮百孔、生态失衡的世界,提出了独具特色并且适应这个

【收稿日期】2012-03-16

【作者简介】孙越(1986-),女,重庆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哲学、科学技术哲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CXLX11_0003)

时代发展的“生态危机”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们认为,“生态危机”缘起于资本主义深层次矛盾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使得资本利润率下降成为了必然的事实,大批工人失业,工资普遍降低,生产相对过剩,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新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缓解并不等于完全根除了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科技在资本主义的舞台上仍然扮演着使资本家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角色,于是商品生产无限扩大化和自然资源开采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激化,“生产的异化”和“消费的异化”让自然资源不断发出濒临枯竭的信号,各种环境问题接踵而至,生态破坏的现象愈演愈烈,人类生存的家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种种不争的事实表明,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了工业社会以来人类面临的一大危机。

一、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生态危机”的阐释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最早开始着手研究生态危机问题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他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到了“启蒙神话自我破灭的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异化”下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2]。本身是为了使人类更好追求自由的科学技术,在经历了近代辉煌的发展之后,不仅没有使人类得到“理性的解放”,反而让人类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在‘知识就是力量’这样一种思维惯性的催化下,人们坚信依靠科学技术和各种自然崇拜的错误理念中挣脱出来,从而以此为手段和工具来完成人类对自然的主宰,所以科学技术与人类理性的‘联姻’被人们普遍视为是‘强强联合’”^[3]。

哈贝马斯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和影响。但他也同时指出,这种危机

并不是单纯地发生在现阶段资本主义的某几个社会中,而是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中必然存在的一个方面。“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4]。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迫使不同的利益集团加紧了对自然的“盘剥”和“榨取”,于是科技便成为了对自然残酷剥削的有力武器。随着人类对自然的侵入,使得自然在内部和外部都达到了承载的极限。一方面,原生性的自然资源濒临匮乏,基本上“捉襟见肘”;另一方面,自然自身的承载和净化能力明显衰退,形成生态自组织的“功能性障碍”。而这一切在哈贝马斯看来,归根结底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所致,换言之,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身上必然存在的一个“毒瘤”。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生态危机研究涉入最深的当属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受到马克思自然观的影响,认为自然的解放是与人类的解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人们发现(或者确切地说是再发现),自然界成为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因为在剥削社会中对自然界的损害加剧了对人的损害。发现解放自然界的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种新型的力量”^[5]。如果自然继续受到压制,人类社会也不会得到进步,真正社会主义的特征应当是“一切属人的感觉特性的彻底解放”。“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6]。这样,在马尔库塞的研究中,“自然的解放”不仅仅只是一个生态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要还原自然自在的状态,就必须要进行社会革命,社会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自由的社会不仅要要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人的团结一致,而且要使自然界本身的力量和特性得以恢复和解放。

二、技术理性的批判: 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代表人物的观点。但是,他们不同的观点中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都强调科技本身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为了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对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秉承这种意志,法兰克福学派展开了三条批判的逻辑进路。

1. 生态危机的缘起: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认为,生态危机的缘起是人文精神与科技精神的分裂,这种分裂集中表现为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虽然早在马克斯·韦伯时期就已经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差别,但是他并没有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而到了法兰克福学派这里,本应处于价值理性指导之下的工具理性却因为对理性主义过分形式化和实用化的要求而最终与价值理性脱节。于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被无限地放大,而对价值理性的审视却被无限地缩小,最终技术便成为了破坏内在理性与外在自然的“祸首”。加之技术的进步使得“控制自然”的观念成为西方社会中普遍接受的伦理准则,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关系日益紧张并开始扭曲,人类在征服客体的同时也成为了和客体本质上一致的“被异化的种子”。这样的工业社会,即使生产力再发达,物质文明再高度繁荣,但由于丧失了精神文明,最终都只能演变成畸形的社会。畸形的社会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沉湎于社会的物质虚假繁荣,而丧失了自身的理性精神,更丧失了对现实科技纯粹工具理性的批判。于是工具理性开始成为合理性的存在,并渐渐转化为政治的合理性。“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生活的全部时空维度,人类的一切制度化、非制度化成就,等等,都被置于技术的关照之下。技术的合理性显露出它的政治性,技术的逻各斯就成为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理性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其本质是统治的合理性,它在意识形态上是欺骗群众的工具”^[7]。

如此一来,以政治力量作为后盾和保障,工具

理性就彻底征服了自然,使得自然成为了人类满足私欲的牺牲品。丧失了价值理性的科学技术,最终沦为了助纣为虐的武器,成为了形式化、量化、毫无人性的可悲工具和引发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

2. 生态危机的扩大:对工具理性否定的否定

对工具理性的否定就是对批判理性的肯定。批判理性是指理性的辩证性、否定性和超越性。如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认为,生态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并成为统治理性的合理性存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格尔也说过,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内在不可调和的首要矛盾。高兹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生产方式,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自然不平等的发展,使得社会呈现出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虚假的繁荣”更加彰显了技术批判理性的重要性。基于此,法兰克福的学者们主张恢复技术理性的批判功能,主张对其工具理性进行根本上的否定,并以此为契机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联盟”,从而抑制生态危机的扩大。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在对工具理性否定的同时,又对自己所做的否定进行了再一次的否定。一方面,他们主张恢复科技在启蒙时代的那种批判理性,肯定科技应有的否定性、超越性和辩证性;另一方面,他们妄图用限制科技本身的发展来实现这种批判理性,忽视当下具体的生产关系,单纯地从技术、人与自然的关中大谈特谈人类的解放,不得不让自己陷入了以科学技术医治科学技术的悖论之中。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恢复批判理性,反而让自身离这种理性越来越远,技术理性的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这里成为了对工具理性否定后的否定。

3. 生态危机的解决:还原自然本身的“美”

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自然观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主张从审美之维度构造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来取代工具理性。在他们看来,以自由的美的意志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以艺术自由的本质实现对技术理性的瓦解,按照美的关系和原则来处理人

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一个物质与生态双向文明社会的基本要义。自然界不仅能够带给人物质上的富裕,更能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只有在艺术的世界中生存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在被消解了的美中存在的人,只是一体化世界中的一个复制品罢了。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不仅破坏了自然本身的美感,更使得自然成为了社会延伸出来的另一只对人类控制的手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法兰克福学派坚持美学还原的思想,认为还原自然本身的美,并按照这种美的内涵和本质,运用技术去实现人与自然的交流和交换,才会让人类和自然得到双重解放。技术不仅要具有“真”的品质,还必须要依托“美”而存在,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解决生态危机的一条重要方法论途径。

三、技术理性批判的批判: 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出路

不可否认,在对生态危机现实困境的哲学思考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其中不少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自然社会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有直接的参考价值。法兰克福学派率先把生态危机当做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他们从关注生态危机本身转向了关注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唇亡齿寒的现实关系,将对生态危机的批判上升到了对现实资本主义不可调和内在矛盾的批判、对科学技术技术理性的批判,甚至对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这不失为人类生态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观中也存在着有失偏颇的一面。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只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和负面作用,并且把这种负面影响无限制放大,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在科学技术这种负面作用和影响背后的社会制度的牵引作用。基于此,法兰克福学派在追问社会制度对人异化的同时,也批判了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本身。但

是,在笔者看来,这种批判并不是全部正确的,技术本身并没有错,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本身与技术运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应该混为一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进行再次批判,这样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出路。

1. 还原双向思维方式:生态危机解决的现实前提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技术理性单向度的批判和解释,使得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即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类就越是被束缚;古代天人合一的状态,才是人类真正自由的表征。这种忽略技术本身内含的价值理性而无限夸大对技术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单向度思维模式的体现。

科学技术确实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错误,而是科技运用过程中的“双刃剑”效应。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科技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但是他们却把这种联系简化为技术本身而非技术运用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而最终将科学本身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混为一谈,以至于走向极端。马克思就曾经以火药为例说过,无论火药是用来伤害一个人的健康,还是拯救一个人的创伤,都不能改变它是火药的事实。“科学的‘人性化’首先必须是社会的人性化,如果批判的矛头仅仅针对科学,那么就会忘记造成这种异化的社会根源”^[7]。回顾历史,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生产力的革命,才引起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历史性的飞跃和发展;也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才引起了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的变革。科学技术不仅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科学技术同样重要,人类要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自然解放为前提的人类解放只能是“乌托邦的幻想”。

还原双向的思维方式,是让人们既看到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一面,也看到科学技术价值理性的一面。只有人们坚持了双向的思维模式,人们才能看到生态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并提出切实

有效的办法;还原双向思维方式,不仅是对技术理性批判的批判基础,也是生态危机解决的现实前提。

2. 转变科技的实践模式:生态危机解决的现实道路

在双向思维模式的指导之下,人们不再单纯地否定科学技术,但是人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反主体性效应仍然存在。要使科学技术的反主体性效应控制在最小范围,作为主体的人们必须要采取更为合理的实践模式来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首先,人们要树立正确的技术观,要认识到技术本身和技术使用是不同范畴的不同事件,从而以正确的、长远的、整体的观念为指导进行科技实践,尽量做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一致和统一,而并非将科学技术本身看做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进而萌生要求消灭科技,回归最原始统一的愚蠢想法。

其次,人们必须在技术运用中改变将自然纯粹当做客体,而严格按照主客二分模式进行实践的价值理念。不可否认,主客二分的观点在近代科技发展中赋予了人类强有力的主体性地位,为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根基,但同时它也忽略了自然本身的作用力。自然也有自组织性和规律性,也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模式,因此,自然不可能单纯地等待人类来征服而成为人类随心所欲改造的客体。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改变以往科技实践的主客二分模式,以新的、整体的实践模式取而代之:即坚持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观点,从单纯地注重人类经济利益或者单纯注重自然利益转向关注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和谐共赢,从而使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精神文明得到协调的发展。

3. 从“美”到“善”:生态危机解决的价值诉求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然本身的“美学”,坚持从美的角度出发,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社会。然而从现实的价值层面来分析,追求“善”比追求“美”更能实现科学价值理性的诉求。

首先,“善”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现实功利主义

有某种联系的“善”,而“美”也是与现实有用性相关的一个概念。于是这里的“善”就成为了“美”的一个重要价值判断因素。要获得和还原“自然的美”就必须明白和了解“自然的善”;相应地,“在善而不是在纯粹审美的层面上推进技术理性价值之维的发展,更具有现实的可行性”^[8]。

其次,“善”还包含“美”不具有的伦理价值导向。生态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失衡的一种表征,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不平等的表现。以“善”取代“美”来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价值诉求,不仅能让科技主体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也注重除人类之外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平衡发展;更能让科技主体背负上一种“大同”的道德责任,一种不仅对当代自然、当代人,更是对未来自然和子孙负责的责任意识,而这也是对技术理性批判的批判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1]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智章,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9.
- [2]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 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
- [3] 谢保军.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15.
- [4] 尤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李黎,郭官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2.
- [5]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 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八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48-149.
- [6]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张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30.
- [7] 詹扬扬. 对技术理性批判的哲学思考[J]. 现代哲学,2001(3):87-90.
- [8] 荀明俐,郑克岭. 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前提批判[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1):8-10.

(下转第105页)

办事处作为独立的机构。

总之,街道办事处职能定位和管理体制改革要有合适的理论视角,任务型组织理论是可以考虑的,作为政府履职方式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摆脱传统的层级化管理思路,才能做出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的改革。

参考文献:

- [1] 罗伯特·丹哈特. 公共组织理论[M]. 2版. 项龙,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93.

On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Structural Reform of Sub-district Offic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ask Organization

WU Fei¹, DA Sulin²

(1. Civil Affairs Bureau of Jianye District, Nanjing 210017,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Sub-district office is a traditional urban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macro-policies, especially with a transformation from economy-oriented society to one that emphasizes social distribution and public service, sub-district office calls for effective reforms. Sub-district offic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trategic choice in the functioning of Government. It may be reasonable to elaborate and interpret the reform in a new perspective and framework of task-based organization theory.

Key words: sub-district office; task-based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functioning approach;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上接第 94 页)

Critique to "Technology Rational Criticism": Inversion on the Technical View of Frankfurt School

SUN Yue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echnology Rational Criticism" is not only the main logical thread in the theory of western Marxism, but also the main top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logical philosophy. Technical rationalit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block of eco-friendly society construction since Frankfurt School raised the similar viewpoin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echnology Rational Criticism" has its positive sides to some extent, however, it is also realized that the critique is not complete. Having reviewed all the theories about Frankfurt School, we can finally conclude that they always ignore the value rationality in technical rationality, presuming the two of no relation to each other, which however must be dimensional both in human body and human thinking.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technology rational criticism; technic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